

吏治腐败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郭宏飞 段 浩 郑姗姗 刘敬龙 史 伟

摘要: 清末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局势,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晚清开明人士发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花费巨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兴建近代企业,但最终没能使中国走向强大、富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吏治腐败对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本文将从社会背景、企业内部等多方位对其进行分析总结,以期对现代以借鉴。

关键词: 吏治腐败; 洋务企业; 影响

兴起于咸丰十年(1861)的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设备、人才,建立近代企业、发展近代军事等基础上走过了艰难的路程,给国人带来了短暂的希望,但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实力”,尽管其后期又展开了一些活动,但对运动本身来说已于事无补。晚清整个官场腐朽糜烂的背景以及企业内部的任人唯亲、盲目决策、中饱私囊、贪污腐化等弊端,使得洋务企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不可遏制的走向破产。

一、吏治腐败在企业中的表现

(一) 任人唯亲

任何活动的成功运行都离不开优秀人才的组织管理,但洋务运动中却盛行任人唯亲,不论才识,这与办新务要求的“唯才是举”是相背离的。洋务企业一个重要特点即是设置庞大的管理机构,人员臃肿不堪。像江南制造局“局中委员数十人,司事一百数十人,除分派各厂所办事外,由于津贴员司数人,差遣委员十余人。”^①其他各厂情况也大致相同。这种管理机制成为督、抚、大臣、督办、总办安插亲信的渊藪。轮船招商局的广州、汉口、天津等分局,就长期控制在唐廷枢、盛宣怀姻亲施紫卿、李鸿章故旧麦佐等手中,由他们“兄授其弟,父传其子,恬不为怪”^②达30年之久。且企业每换一次总办,新总办即添用自己的心腹。福建轮船招商局每“‘总’(办)之缺,向归(大)总办分配,非唐(唐廷枢)即徐(徐润),(括号内字为引者注)间用他姓,则须打通关节与居中有力量者分做,即暗地分财之谓也,此种人品,一得‘总’,便引用亲朋至二三十之多”^③。

滥用私人导致机构臃肿不堪,人浮于事,因为这些“津贴、差遣之员,大率因情面而来,但取俸薪,并无执役。”^④且这些人大多不熟悉先进科技,又不悉心学习却官气十足,把官场恶习带到现代化的工厂,导致工厂风气不良,降低了办事效率。如此多的管理人员也极大地增加了企业负担,冗员“每月薪水多者数十金,少亦十余两,以岁计之,为数甚巨”^⑤,据统计,上海机器制造局光绪十一年委员、司事薪水并一切公费占实际支出的19%,光绪十二年占16%,光绪十四年占到支出的14%。^⑥如此多的经费支出使得企业在资金一定的情况下减少了实际运营的资本投入,以致当时就有人说“历任大臣收用员绅为数过多,薪水津贴等项需款太巨,……造船经费不能统归实用”^⑦,由此可见,所谓的洋务企业,变成了家族化的另类“官僚疗养所”,这样的企业难以壮大。

(二) 盲目决策

任用私人除上述影响外还会导致决策失误。张之洞因盲目自大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兴办汉阳钢铁厂时向英国梯赛特机器厂购买机炉,当该厂提出先化验铁石、煤焦质地而后始可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机炉的要求时,张之洞却说“以中国之大,向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⑧。英国厂方为之愕然,胡乱搭配了一座灰色麻炼钢炉和一座小马丁炼钢炉。结果买回来的机炉所制之钢含磷太多,练出来的钢轨易脆不得用,导致产品长期滞销,直至10年后,购买了新的机炉问题才得以解决,浪费了大量的钢铁原料和资金、人力,时人评议“糜去十余年光阴,耗去千万之成本”^⑨。

洋务企业管理者多为官场中人,官气难除,于商务皆昏聩。张之洞

还是兴办洋务认真的大元尚且由此等失误,企业其他负责人对于通过裙带进来的人更不问其材之能否胜任,且纨绔子弟多嚣张跋扈,刚愎自用,不知洋务军事为何却不肯虚心学习,只知发号施令,导致更多的决策失误,造成了资本的大量浪费,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三) 中饱私囊

晚清政局普遍存在贪污受贿之风,在洋务运动中,各级官吏更是变本加厉,从中肥私。他们贪污的手段很多,其中主要有:一、购进原料,私吞价格差价。官员借购买原料之名获得财政支持,但在汇报时,故意抬高物料价格,运用实际价格与汇报价格差价从中肥私。其中江南制造局购买物料时即“经总办议定价后订立承揽合同时照原价加二五(即在原价基础上加增25%)此二五为总办及亲信人所得,其余库房及经手人等又于原价之内索回佣,明示人以弊端所在……”^⑩二、挪用公款,如轮船招商局即公私混乱,挪欠自如。“唐总办(唐廷枢)欠六七万,徐(徐润)欠二万余,各司董所欠不等。……此特其净欠者耳,更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三十余万之多者。徐道名下押有十五万,其实并无抵物可以赎回,以致局无现银,去年九月几乎倒闭。”^⑪三、贪污中饱,江南制造局“总办以下各员司,往往于私家合用之物相率效尤,任意索取,木器则取给于木工两厂,铜铁等器则取给于洋枪熟铁等厂,以致各匠久料造物,私行售卖,煤炭耗散尤多,旷公靡费,莫此为甚。”^⑫云南铜矿“自经机器开采,出铜颇多。惟所用未得其人,每有潜入私囊,肆行吞蚀者,故经费支绌,旁观者皆寒心。”^⑬如此无孔不入的贪腐行为,让人愤慨。

(四) 其他方面

除企业内部存在种种弊端外,整个社会环境的腐朽糜烂也给洋务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晚清吏治的腐败已是众所周知,自上而下的卖官鬻爵,各级官吏的官官相护,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这在洋务企业的兴办中也有所体现。曾任江南制造局总办的赵彦彦既曾揭发江南制造局的数端腐败现象时说“在局员司,只可随波逐流,不可矫同立异。间有办事认真,不避嫌怨,即群起而讪笑之甚至匿名揭帖,指摘交加。……稍不随意,百般排挤,妨贤害能,可胜浩叹。”^⑭且奏折中所谓厂内工作一切,必曰“已臻完善”,饬令省料,必曰“所用不敷”,财政汇报必曰“毫无虚糜”“委系实在情形”,官官相护之严重由此可见。

二、吏治腐败的原因及影响

导致吏治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官吏道德自律堤防的普遍溃决,有社会风气的奢靡颓废,有官场风气的败坏,有立法、司法上的失误等。从社会经济学角度讲,人是具有趋利性的经济人,他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洋务官员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腐败行为的,在实施腐败行为前他会考虑:如果实施腐败行为发现后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腐败行为中获得些什么,即腐败行为成本和腐败行为收益。所谓腐败行为成本是指官员因为其腐败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嘉庆即位后在清律中规定完赃可以减等发落,即使“三年限外不完”,死罪人犯仍“永远监禁”,即贪污官吏贪得再多,最多是在监狱里呆一辈子,且清代官场关系网错综复杂,官官相护严重,很多腐败行为被掩埋在这严密的网络下不易被朝廷知晓,这为官员减轻处罚提

作者简介: 郭宏飞, (1989—) 女, 山东滨州人,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等研究。

供了条件,降低了腐败行为成本,客观上促使一些潜在受贿人产生侥幸心理,从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官员腐败行为收益指的是行政官员通过腐败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包括物质利益,同时也包括精神利益。官员腐败行为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给自己及其亲属同僚带来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官员腐败违法犯罪行为产生的强大动力。于是当官员们发现:通过贪污所得利益远远大于自己所付出的成本时,他们便会无所顾忌的大肆贪污,且在上下同僚都“中饱贪腐”的环境下,原先宁守清廉的官员也不免被“熏陶渐染”。

就这样,工厂在生产中创造的利润,被腐朽的吏治耗费掉了,限制了企业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洋务企业资金来源大致有三:一是政府拨款,二是民间筹股,三是企业自身盈利。晚清因战争赔款等资金本不充裕,政府对洋务企业的支持也不如日本明治政府对其殖产兴业那般坚决,为数不多的拨款被上文所说的企业种种腐败分子贪污或盲目决策所浪费,实际用于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资本屈指可数。且清政府本想利用民间筹款方式获得商人的资本达到其“致富”目的,但因其经营中弊端丛生,贪污腐化盛行等导致企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且官商本应“甘苦与共……按年计息”但却“仅将官帑缓息八年,商息留半抵本,恐尚不敷补缺。”^⑤有的企业经营者甚至“买空卖空,专视票价涨落以罔市利”,结果导致股本“积久无成,竟成废纸,一转移间,乾设商本大半,商人一再受亏”^⑥这一切使得大商贾纷纷迟疑阻,闻风裹足。对于企业自身来说,所用之人于技术不甚精通,监管者更是不详加验视,所造之船、枪、弹、药多不新颖、适用,导致市场狭小,企业收益不佳。这样,企业收益差,私人资本聚集困难,政府拨款利用率又低,企业发展资本缺乏来源,资本积累难以实现。同时,洋务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上下其手的偷工减料,贪污中饱等致使产品质量不高,即使本国人员仍倾向于购买外货《刘坤一遗集》中即载“各省需用轮船多向外洋订购,中国船政局每欲承揽一二只而不可得一”这样就在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和本国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洋务企业的市场变得越狭小。

企业进一步扩大必备的两项:资本和市场,洋务企业无一具备,这就注定了洋务企业的破产。由于整个官场弥漫着腐败浓厚的气息,洋务大员们主办的洋务企业,尤其是官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不免熏陶渐染,从总办到长工,上下其手贪污中饱,中饱后所剩无多的资本因任用私人机构臃肿或决策失误等造成浪费,生产出众多不合格的产品,这些产品使得购买者多不愿意继续从中购买,即使政府强制要求也不行,市场越发缩小。就这样,在资本、市场都不能满足企业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企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产。随着企业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其他措施,如新

式教育、新式海军等缺乏经济资助和舆论支持,最终也未能取得理想效果,洋务运动不可遏制地走向了破产。(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指导老师: 阎东凯

注解

- ① 魏允恭: 五月总办魏允恭禀整顿沪局兼筹建萍局情形, 洋务运动四 [K],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11。
- ② 招商局三大案 [F], 现代书局, 1933, 52。
- ③ 马长, 改革招商局建议, 洋务运动六 [K],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25。
- ④ 魏允恭, 光绪三十年五月总办魏允恭禀整顿沪局兼筹建萍局情形, 洋务运动四 [K],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11。
- ⑤ 魏允恭, 光绪三十年五月总办魏允恭禀整顿沪局兼筹建萍局情形, 洋务运动四 [K],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11。
- ⑥ 根据《洋务运动》四关于上海机器局各奏折整理。
- ⑦ 殷如璋: 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御殷如璋史片, 洋务运动五 [K],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21。
- ⑧ 叶景葵: 记汉治萍,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 [F], 陈真, 1961, 468。
- ⑨ 中国史学会主编 [K] 洋务运动八 [K],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528。
- ⑩ 陈真: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 [F], 1961, 78-79。
- ⑪ 马长: 改革招商局建议, 洋务运动六 [K],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26。
- ⑫ 陈真: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 [F], 1961, 80。
- ⑬ 陈真: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 [F], 1961, 707。
- ⑭ 赵滨彦: 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疏稿 89-91。转引自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二卷 [K] 2003, 1553。
- ⑮ 李鸿章等: 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 洋务运动五 [K],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3-25。
- ⑯ 中国史学会主编: 矿务档(一), 洋务运动五 [K],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95。

